

《史记·天官书》“天人之变”思想的易学渊源

朱君毅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的占星学中,集中表现了“天地对应”“天人感应”和“顺天休命”的天人观,这与《周易》中“天地生人”“人法天地”和“天人交感”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三五之变”的变化发展观,这种观点与《周易》中的“变乃常道”“无往不复”和“通变之为事”的思想基本一致。

关键词:《史记·天官书》;天人之变;易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2-0080-04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13

司马迁在《天官书》中描述了经星和纬星的位置、颜色、光芒以及变异情况,并用分野方法将天地进行对应,指出了日月、异星、云气、岁时变化与人事的占验对应关系,试图通过星占学来实现其“究天人之际”之目的。从《史记》中对《周易》的记载和论述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易学思想来看,司马迁毫无疑问是精通《周易》的。对此有学者指出:第一,从先秦以来史官的职责来看,通《周易》是对史职的基本要求。第二,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来看,司马谈“受《周易》于杨何”,他弥留之际曾嘱咐司马迁要以“绍明世、正《易传》”为作史之旨,说明《周易》为其家学之一。第三,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推崇《周易》,他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周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说明司马迁精通《周易》且对其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因此《天官书》也势必要受到《周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变”的思想和比附的方法,与《周易》中的相关思想有着较深的渊源。

一、天人感应论

1. 天地对应

《周易》理论的出发点就在于试图用符号体系来象征宇宙、社会的原理,并试图用这种原理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如《易传》所说:“《周易》与天地准,故

能弥纶天地之道。”^{[2]539}宇宙万物的产生均是从太极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八卦之中,以“乾”“坤”二卦为根本。此二卦是天地和阴阳的象征,而万物及人类的产生都离不开阴阳。因此《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2]213}“至哉坤元,万物资生”^{[2]226}。即是说万物藉以发生发展的源头就是乾与坤。《系辞》也用天地、男女象征阴阳交融而化生的原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564},形象地表现了宇宙万物以及处于其中的人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司马迁吸收易学思想,结合当时流行的分野观和五行观,提出天与地是相互对应的。“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3]1342}《天官书》继承前代的“分野”观念,将天空划分为不同区域,并认为这些区域与地上的不同地域是一一对应的。司马迁《天官书》建立了不同的“分野”系统。具体来说,有北斗分野:“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3]1291}有二十八宿分野,即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对应,一是二十八宿和十二州的对应。有行星和恒星结合的分野,还有辰星分野以及“日、月食天干分野”^[4]。同时司马迁还对照人间的相关事物,在《天官书》中建立

收稿日期:2016-04-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ZH266)

作者简介:朱君毅(1978-),男,甘肃庆阳人,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E-mail:zhujunyi99@163.com

了天上的世界。其中有帝庭、明堂、离宫、天阙、天市、天街、天厠、天库楼、疏庙、清庙、牢等建筑设施,有帝车、天枪、天棓、天矢、矛、盾、弧、钺、车、天旗、杵、臼、河鼓等器物,有天驷、右骖、牵牛、狼、柳、翼、封豕等动植物,还有北河、南河、咸池、天潢等河流。

2. 天人感应

《周易》认为,人法天地、天道约束人道的重要途径就是“感”和“交”。

首先是“感”。一方面,天地感应而生万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563} 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有感应。《彖》在解释《咸》卦时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2]373} 这是说刚柔二气相互感应而交融。不仅如此,天与地之间、圣人与普通人之间可以感应:“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2]373} 因而“感”是自然万物产生的途径,也是人们和平共处的前提。

如上所述,如果只有“感应”而没有“相与”,那就没有“止而说”“万物化生”以及“天下和平”。因此除了“感”还要有“交”。《泰》卦《象》曰:“天地交,泰”^{[2]276},这就指出了“交”的重要性所在。《泰》卦《彖》则进一步强调了“天地交”和“上下交”的重要性:“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2]276} 也正是由于“万物通”和“上下志同”,才得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276}。

“星官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3]1289}。天上如同人类社会,也有其特定的秩序和规则。日月星辰都有人格化的星官,因此《天官书》中用人间朝廷的官职名称来命名众多的星官,并对其进行等级划分。例如子属、正妃、后宫、九子、诸侯、三公、藩臣、上将、羽林天军、相、司禄、骑官、司空等。

不仅如此,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往往预示了人间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上述地域的对应和官职的对应完全一致。《天官书》里面用大量的文字描述了这种原理,也记载了不少历史事件来印证。例如通过秦吞并三晋、燕、代时的日、岁星、荧惑、填星和月、太白、辰星阴或阳的属性,及其与地域南北的对应关系,指出“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3]1347},说明星占的重要性。又列举了“秦始皇时,彗星四见”“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3]1348}“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3]1348}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星象之间的联系,试图证明天人感应理论的合理性。

3. 顺天休命

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那么其生产生活的实践自然也应该遵循天地的法则。《周易》中就有多处表现了这种思想。例如《说卦》就从天地之“道”引出了为人处世之道:“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周易》六画而成卦。”^{[2]576} 认为圣人在作《周易》时,用三画象征天地人三才,两两相重而成一卦六画。而阴与阳、柔与刚是天地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为人处世也要遵循相应的规则,即“仁”与“义”。《系辞》中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2]572} 人法天地首先要认知自然规律,从而才能在立身处世方面合乎这些规律。《文言》中说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217} 就是说,“大人”要认知和遵循的是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时之序以及鬼神之吉凶。如果能够“承天而时行”,则天地人神都不会违背他:“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2]217} 当然,如果不奉天而行,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天道具有对人道的约束作用,所以才会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2]229}的结论。

既然日月星辰等天象变化能够预示人间大事的发生,那就有必要通过占卜的手段来预测,并采取相关措施来对应。司马迁在《日者列传》中感叹说:“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3]3215} 在《龟策列传》又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3]3223} 并认为在决定国家大事方面,占卜具有不可取代的辅助功能:“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3]3223} 卜筮蓍龟是传统的预测术,《天官书》则是司马迁对传统星占学的总结和提升。他在其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3]1342} 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对“常星”“三光”“日月晕”“云”“风”五者的变化予以足够重视,要做到“凡天变,过度乃占”^{[3]1351},并根据其变化所预示的内容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具体来说,是“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3]1351},即根据日月星的变化分别加强修德、减少刑罚或结和人心。这其中居于首位的是修德:“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禋,正下无之。”^{[3]1351}

司马迁对龟策、占筮以及星占都有较深的研究,其天人关系论也集中体现于《天官书》等篇目中。《周易·系辞》中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2]535}表现了对自然现象的高度重视,而《天官书》中引用《系辞》中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2]539},并将其应用于占星术,就是对这种理念的具体实践。他在其中表达的天人对应、天人感应以及顺天休命等理论,正是对《周易》中的天地生人、人法天地和天人交感观念的继承和深化。

二、“通变”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经传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变易。无论是从阴阳二爻到六十四卦的发展,还是在每一卦内部,或在卦辞和爻辞中,都体现了变易的思想。

1. 变乃常道

《周易》中关于变化的论述很多,分别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其“变易”理论。但是都说明一个道理:变化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特性。例如“日新之谓盛德”^{[2]543}“生生之谓易”^{[2]543},就是讲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和更新的道理。“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学典要,唯变所适”^{[2]569}“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553},以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2]537}“变化者,进退之象也”^{[2]537},都是对“变易”众多特征的描述,意在说明万事万物均处于阴阳、刚柔、上下、进退的变动之中。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559},则指出只有变化才能使宇宙万物持续发展。《周易》的作者认识到这些原理,因此首先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2]535}。然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2]554},即通过卦爻的方式来表达变化的道理,所以说“爻者,言乎变者也”^{[2]538}。最终说,《周易》对变化之道的表达无所不包:“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2]541}

《周易》认为,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2]277}就是说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并非直线式的,而是有其循环往复的独特规律。《象传》进一步发挥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2]277},更是将物极必反的规律推广到天地万物之间。相应地,在《彖传·复》中也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2]336}对此王弼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则是对“往来不穷”的最好注脚。

司马迁在《史记》各篇目中通过对天人关系、历史大事发展变化的探究,试图总结出“变”的规律来。

《天官书》正是对“天变”与“人变”关系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探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三五”之说的阐述。在对众多天象和历史事件考察之后,司马迁发现,“三”和“五”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数字,也是天变与人变规律的集中体现。他在《天官书》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3]1344}就是说,日月星的运行及异常天象的变化有时间上的规律,即三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五百年(一纪)、四千五百年(三纪)就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三五”不仅是说时间规律,同时也是对日月星辰数量等属性的表述。“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3]1351}在这里,司马迁似乎是将日月星“三光”称为“三”,将与此相关的天象变化称为“五”。同样的表述在《天官书》中屡屡出现,例如认为“风从西北来”时,就说“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毕、昂为之围”,就是“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另外还有“三能、三衡者,天廷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西宫咸池,曰天五潢”“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等,都有“三”或“五”的数字出现。这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五行”等观念有关,但是使用频率之高,却也表现了司马迁对这两个数字的重视及其把握天人变化规律的愿望。

2. “通变之为事”

《周易》试图通过抽象的卦象来概括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即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例如八卦象征天与地、风与雷、水与火、山与泽,而《说卦》基于对八卦及相关事物五行属性的认识,认为“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2]578},又推而广之,将众多事物分别通过八卦来归类。其中归入“乾”的就有14种:“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2]579}

通过八卦对事物进行分类,可以看作是古人对自然的基本把握方式之一。但是人们更关注的则是

人事变化。《周易》的作者坚信,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卦象演变的规律来把握。因此研究卦象“不仅是对数目分为奇偶的认识,而且包括各方面的生活经验。如月出日落、水火相激、冬去春来等自然现象;治乱无常、国家兴衰、君尊臣卑等社会现象;男女有别,手足异用等生理现象;旱涝丰歉,耕获菑畲等生产经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行旅经验;朋贝得失,小往大来等商业经验;师出以律,行险而顺等战争经验。”^[5]于是在《易传》中才多有“拟议以成其变化”^{[2]546}“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2]549}“知变化之道者,岂知神之所为乎”^{[2]550}等话语,强调了卦变与人变或事变之间的神秘关联。

“三五之变”的观念,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对天人之变规律的把握,从中也可以看出对《周易》变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易》以道化”,表明了他对《周易》阐述变化这一基本主题的认同。他认为,天运在特定的时期内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正是对《周易》“变动不居”和“无往不复”思想的具体化。为国者之所以要通“三五”之数,是因为天象之变即地、人之变,因此“在天成象,有同影响。观文察变,其来自往”^{[3]1354}。司马迁还强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负责观天象的官员,都必须掌握这种规律:“为国者必贵三、五”^{[3]1344}“为天数者,必通三五”^{[3]1351},唯有如此,才能“终始

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3]1351}。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与《周易》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说法同出一辙。

三、结语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标很明确,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天官书》正是“究天人之际”的重要篇目之一。《周易》是从宏观的角度,以“立象以尽意”的方式来表现其天人关系观。司马迁对其中的天人感应观和通变思想有着较深的认知,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在《天官书》的创作中。《天官书》中不仅表现了对天人关系的关注,并对其“仰观”和“俯察”的手段进行了具体化。《天官书》指出,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有其主宰星官,这些星官与人间的官员相对应;星官及其附属设施与人间的相关事物相对应;日月星辰所在的区域与人间的不同地域相对应。天象发生变化时,就意味着人间也会发生一些大事。所以人类应该通“三五之术”,以便根据上天的意志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因此《天官书》中的天人对应及感应、顺天修德等思想显然不是司马迁的独创,而是其在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的基础上,对已有的卜筮、星占以及大量的历史事件与星象变化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而“成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 [1] 林晓平.《周易》对司马迁、班固史学的影响初探[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1):51—52.
- [2] 王弼. 王弼集校释[M]. 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赵继宁. 试论司马迁的天人感应观[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4):52—55.
- [5] 朱伯崑,等. 周易通释[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31

[责任编辑 许婴]

The Yi-ology Origin of the Idea of “Heaven-Man Change” in *Historical Records · Tianguan Book*

ZHU Jun-y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edi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astrology in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 Tianguan Book* intently shows the heaven-man ideas of “heaven-earth corresponding”, “heaven-earth induction” and “heaven obeying or life ending”,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ideas of “man of heaven-earth”, “man emulating heaven-earth” and “heaven-man interaction” in *Yi Jing*,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change-development idea of “change of three poles and five phases” came into be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s in *Yi Jing* of “change always being the principle”, “everything going in a cyclic way” and “better to know the principle of changes”.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 Tianguan Book*; the change of heaven and man; the thinking of the Yi study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试论道教易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 [2. 中国传统救荒思想的哲学渊源:天人合一思想](#)
- [3. 学究天人,体贯古今--谈谈《史记》的体例](#)
- [4. 易学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
- [5. 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 [6. 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
- [7. 横渠易学的天人观](#)
- [8. 论《荀子》与《史记》在天人关系方面的异同](#)
- [9. 论唐宋历次变法的思想渊源——从变与不变的角度](#)
- [10. 变汉字难学为易学](#)
- [11. 《史记·天官书》中官“左右”方位献疑](#)
- [12. 《史记·天官书》校补](#)
- [13. 试论《史记》中的“天人感应”观念](#)
- [14. 《史记·天官书》“天人之变”思想的易学渊源](#)
- [15. 试论司马迁的天人感应观——以《史记·天官书》为视角](#)
- [16. 王安石易学的思想渊源](#)
- [17. 《史记》“究天之际”与史官传统](#)
- [18. 《吕氏春秋》天文史料与《史记·天官书》比较探析](#)
- [19. 《史记·天官书》考释](#)
- [20. 论《史记·天官书》易学思想](#)
- [21. 《史记·天官书》献疑\(一\)](#)
- [22. 《史记·天官书》作者、取材考](#)
- [23. 简说《史记·天官书》](#)
- [24. 司马迁的易学渊源及其易学思想](#)

- [32. 论焦竑文学思想与苏轼易学的渊源](#)
- [33. 司马迁的易学渊源及其易学思想](#)
- [34. 《史记·天官书》校补](#)
- [35. 王通的天人思想](#)
- [36. 由《史记·天官书》看上古社会政治、军事思想](#)
- [37. “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的渊源](#)
- [38. 《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
- [39. 《史记》易学与数术学发微](#)
- [40. 《史记·天官书》星象\(待续\)——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
- [41. 经络学说中的易学天人观](#)
- [42. 《史记·天官书》献疑\(三\)](#)
- [43. 郭璞易学渊源考](#)
- [44. 《史记·天官书》献疑\(二\)](#)
- [45. 《伤寒论》“天人相应”思想渊源研究](#)
- [46. 王通的天人思想](#)
- [47. 《史记》易学思想研究综述](#)
- [48. 李光地易学渊源考](#)
- [49. 《史记·天官书》作者、取材考](#)
- [50. 《史记·天官书》星象\(续完\)——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